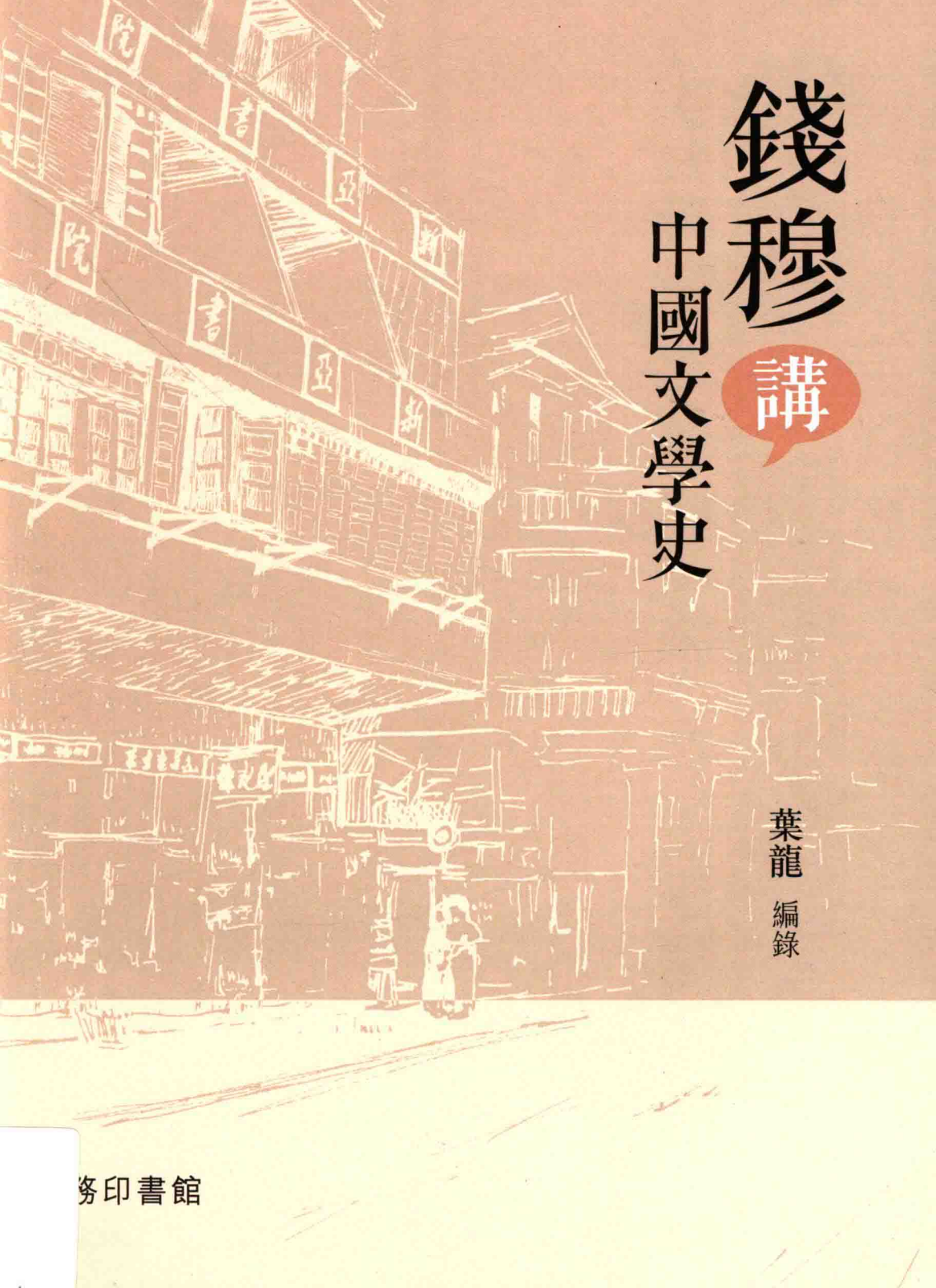




錢穆

講

中國文學史

葉龍
編錄

務印書館

錢穆講

中國文學史

葉龍
編錄

商務印書館

錢穆講中國文學史

編 錄：葉 龍

責任編輯：張宇程

封面設計：涂 慧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14字樓

版 次：201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4525 6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駱玉明序

在老一輩學術名家中，錢穆先生以學問淵博、著述宏富著稱。不過，他對古代文學這一塊說得不多。《錢賓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冊，談中國古今文學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冊《中國文學論叢》中，佔全集的比例甚小。這些文章論題相當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國文學史概觀》一篇，略為完整而系統。因此，如今有葉龍先生將錢穆先生 1955 至 1956 年間在香港新亞書院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堂筆錄整理成書，公之於眾，實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情。錢先生是大學者，我們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學術的一個以前我們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對於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來說，更能夠得到許多有益的啟迪。

從前老先生上課大多自由無羈。我曾聽說蔣天樞先生講第一段文學史(唐以前)，學期終了，楚辭還沒有講完。錢穆先生的文學史分成三十篇，從文學起源講到明清章回小說，結構是相當完整的了。不過講課還是跟著述不一樣，各篇之間，簡單的可以是寥寥數語，詳盡的可以是細細考論，對均衡是不甚講究的。而作為學生的課堂筆記，誤聽啊漏記啊也總是難免。要是拿專著的標準來度量，會覺得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

但筆錄也自有筆錄的好處。老師在課堂上講話，興到之處，常常會冒出些“奇談妙論”，見性情而有趣味。若是做文章，就算寫出來也會被刪掉。譬如錢先生說孔子之偉大，“正如一間百貨公司，貨真而價實”。這話簡單好懂容易記，卻又是特別中肯。蓋孔子最要講的是一個“誠”，連說話太利索他都覺得可疑。“百貨公司，貨真價實”不好用作學術評價，但學生若是有悟性的，從中可以體會出許多東西。而現在我們作為文本來讀，會心處，仍可聽到聲音的親切。

要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現代學科，我們知道它是起於西洋；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也不是中國人寫的。但絕不能夠說，中國人的文學史意識是由外國人灌輸的。事實上，中國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學現象在歷史過程中的變化。至少在南朝，如《詩品》討論五言詩的源流，《文心雕龍》討論文學與時代的關係，都有很強烈的文學史意識；至若沈約寫《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寫《南齊書·文學傳論》，也同樣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並提出了出色的見解。中國文學有自己的道路，中國古賢對文學的價值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我看來，錢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既認識到它作為一門現代學科的特質，同時又深刻地關注中國傳統上的文學價值觀和文學史意識。在眾多重大問題上，錢先生都避免用西方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而盡可能從文化機制的不同來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使人們對中國文學的特點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許，我們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與錢先生有所不同，但他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卻是有普遍意義的——這還不僅僅由文學而言。

錢先生是一個樸實而清晰的人，他做學問往往能夠簡單直截地抓住要害，不需要做多少細瑣的考論。譬如關於中國古代神話，中日一些學者發表過各種各樣的見解。有的說因為中國古人生活環境艱苦，不善於幻想，所以神話不發達；有的說因為中國神話融入了歷史傳說，所以神話色彩被沖淡了，等等。但這樣說其實都忽略了原生態的神話和文學化的神話不是同樣的東西。前些年我寫《簡明中國文學史》，提出要注意兩者的區別，認為中國古代神話沒有發展為文學，而這是受更大文化條件制約的結果。我自己覺得在這裏頗有心得。但這次看錢先生的文學史，發現他早已說得很清楚了：

“至於神話，故事則是任何地方都有的產物。中國古代已有，但早前未有形成文學而已。在西方則由神話、故事而有文學。中國之所以當時沒有形成文學，是由於文化背

景之有所不同所致，吾人不能用批評，只宜從歷史、文化中去找答案，才能說明中西為何有異。”

我們都知道錢先生是一位尊重儒家思想傳統的學者。儒家對文學價值的看法，是重視它的社會功用，要求文學有益於政治和世道人心，而錢先生是認同這一原則的。所以，在文學成就的評價上，他認為杜甫高於李白，陶淵明高於謝靈運，諸如此類。站在儒者的文學立場上，這樣看很自然，也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與此同時，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錢先生對文學情趣的重視和敏感。他說：

“好的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純真與自然。真是指講真理、講真情。鳥鳴獸啼是自然的，雄鳥鳴聲向雌鳥求愛固然是出於求愛，但晨鳥在一無用心時鳴唱幾聲，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的開放，如空谷幽蘭，它不為甚麼，也沒有為任何特定的對象而開放；又如行雲流水，也是雲不為甚麼而行，水不為甚麼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這些議論使人感到，錢穆先生對文學的理解，有其非常重視美感的一面。他特別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就是因為它輕快自如，毫不造作（這和魯迅一致）。而且在錢先生看來，正是由於曹操文學的這一特點，他在文學史上佔有崇高的地位。錢先生說：“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是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

錢先生對中國古代詩歌中的賦比興，有不同尋常的理解，這和他重視文學情趣的態度也是有關的。他引宋人李仲蒙解釋賦比興之說，歸結其意，謂：“意即無論是賦，是比，或是興，均有‘物’與‘情’兩字。”然後解釋道：

“俗語說：‘萬物一體。’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學家都會講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種哲學思想均寓於文學中，在思想史中卻是無法找到這理論的。我們任意舉兩句詩，如，‘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我人沉浸在此種情調中時，但不能說是寫實文學，因為它不限時、地、人；也不能說其浪漫；且狗吠雞鳴亦非泛神思想，亦非唯物觀，此乃人生在大自然中之融洽與合一，是賦，對人生感覺到有生意有興象之味，猶如得到生命一般。”

賦比興都是追求天人合人、心物合一的意境，這個說法以前是沒有的。但確實，我們在讀這些文字時會感到一種欣喜，我們會感到自己對詩歌有了更親切的理解。

從歷史與社會來說文學，從文化環境說文學，從中西比較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眼界開闊、立論宏大的一面；從自由灑脫、輕盈空靈的個性表現說文學，從心物一體、生命與大自然相融的快樂說文學，這是錢穆先生《中國文學史》偏愛性靈、推崇趣味的一面。兩者不可偏廢。

至於錢先生講課一開始就說：“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倒沒有甚麼特別可以感慨和驚奇的。以中國文學歷史之悠久、作品數量之龐大、文學現象之複雜，文學史寫作幾乎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至於“理想”的文學史，只能是不斷追求的目標吧。

駱玉明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志誠序

繼《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之後，學長葉龍教授有意將他珍藏多年、修讀錢賓四師“中國文學史”課時的筆記整理，然後付梓出版。現在經已整理完成，書名就叫《錢穆講中國文學史》，並囑我為這本書寫篇序。我一方面感到萬分的興奮和榮幸，另一方面，我又深感慚愧，我哪有資格為這本書寫序？恐怕葉師兄之屬意於我，一來因為我們是同門師兄弟，無論是在新亞書院抑或新亞研究所，他都是我的前輩。二來，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我們都先後修讀過錢師的“中國文學史”，彼此應該有些相關的話題和體會。葉師兄盛意拳拳，我就只好勉力而為，答應過來。但談的都是個人的感受和印象，而且拉雜說來，稱不上是篇像樣的書序。

葉師兄和我雖然先後都修讀過錢師“中國文學史”的課，不過，效果卻可並不一樣。首先，他修讀的時間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而我修讀的則在六十年代初。其次，他修讀的是整年的完整課程，而我修讀的只是半年的課，下半年即由另一位老師替代了。那是因為作為新亞書院的院長，錢師在五十年代中之時，仍可專注於院內的校務和教務，但到了六十年代初，他已因書院要併入中文大學作為三所成員學院之一而非常忙碌，無法多兼教學工作，所以“中國文學史”課只教了半年便沒有繼續下去。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葉師兄是江浙人，他聽錢師課的能力比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強，吸收上比較容易。再加上他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態度都相當好，所以，他的聽講筆記詳細而精確，可以充分反映錢師的講課內容，堪稱是課堂的實錄。

眾所周知，錢賓四師是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譽滿中外，著作等

身。他又非常熱愛自己的家國和中華文化，“九·一八事變”之後，因應教育部將“中國通史”成為大學必修科以振起國魂之規定，他在大學講授該科，所編寫的講義即成為日後部定大學用書的《國史大綱》。是書不但足以喚醒國魂，亦加深國人對國史的認識，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而錢師也奠定了他在史學權威的地位。除《國史大綱》外，他的著述包括《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莊老通辨》、《莊子纂箋》、《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文化學大義》、《中國思想史》、《國史新論》、《宋明理學概述》、《四書釋義》、《論語新解》、《中國歷史研究法》、《史記地名考》、《中國文化精神》、《陽明學述要》、《中國文化叢談》、《朱子新學案》、《中國文學講演集》等，洋洋大觀，非常豐富。

細看錢師的著述內容，都是以史學、經學、文化、思想、考據、理學等範圍的學術性論文為主，屬於文學的，就只有《中國文學講演集》而已。這本《中國文學講演集》，原是錢師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紀錄，計共十六篇，1963年由香港人生雜誌社出版。篇幅雖不太多，但涉及的範圍卻相當廣闊，所提的論點也很深入，頗多獨到的見解。此書1983年增加了十四篇，共三十篇，改名《中國文學論叢》，由台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除了這些偏重作品欣賞與研究的文章外，錢師也有些情文並茂、感人至深的文學作品，如《朱懷天先生紀念集》、《潮上閒思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靈魂與心》、《雙溪獨語》、《晚學盲言》等抒發個人思想與感情之作。顯然地，我們的史學權威、國學大師，一直都沒有忽略對文學的興趣，至於“中國文學史”，更是他經常在教壇上要講授的課。

錢師個子不高，但步履穩重，雙目炯炯有神，使人望之而生莫名之畏。加上他在講課時，聲音嘹亮，抑揚有致，徐疾有度。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散發出一股非常獨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國文學史”課之時，同學們都全神貫注，靜心聽講。他的每一課就像每一個專題一

樣，非常吸引。

我們新亞有個很好的傳統，就是每個月都有個月會舉行，全校學生都會參加，除了簡單的校務報告外，還會邀請嘉賓或校內老師作主題演講，演講辭都由學生作紀錄，然後刊登在定期出版的《新亞生活》刊物上。錢師是主要講者之一，這些講辭，其後都彙集成書，取名《新亞遺鐸》。此外，錢師也往往受邀到校外機構作專題演講，不論是校內校外，大都有一位同學獲指派替他作紀錄。而在這些同學之中，我們廣東籍的學生往往只是偶一為之而已。就記憶所及，替錢師作紀錄最多的，葉師兄應該是其中極少數者之一。他一直追隨着錢師，也一直好好地珍藏着他所紀錄的錢師筆記。他應該是錢師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早前他在報刊所發表的錢師論經濟、《錢穆講中國經濟史》以及《錢穆講學粹語錄》等，都是他積存多年下來的成果。而對錢師學術的傳揚，也可說貢獻良多，居功至偉。

如今，錢師講授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就要出版了，這真是莫大的喜訊。尤其像我這麼樣的後輩，只修讀過半年的課而已。現在雖已是垂暮之年，但依然有機會看到錢師完整的“中國文學史”面世，圓了多年未完之夢，又怎能不喜出望外呢？而於葉師兄一再推廣錢師學術、惠益後人的初衷，又怎可以只是向他再三致謝而已呢？——是為序。

陳志誠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系前主任及
新亞研究所前所長

葉龍序

記得在二零一二年冬某日，在夏仁山學長的介紹下，有幸與新亞老校友黃浩潮、葉永生諸兄一同茶聚，談起我有一份業師錢穆賓四先生的“講學粹語”稿和二十多封錢師親筆函件，還有曾在香港《信報》連載的錢師講課的“中國經濟史”筆記和我本人的撰述，也曾在《信報》連載約有三十萬字的〈歷代人物經濟故事〉。上述多位學兄異口同聲的，都認為值得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因為有新亞歷史系的陸國榮校友及同時兼管商務業務的陳萬雄董事長也是校友。

不久與陸兄再次茶聚後，便帶同文稿邀我同車回商務見負責出版中文書籍的總編毛永波先生。到了商務總部，國榮兄把所有上述稿件全部交給永波先生審閱並由他作出決定。由於永波先生是資深出版家，對兩岸四地的中文出版狀況瞭如指掌，由他即時決定先出錢師講的“中國經濟史”，然後再出“錢穆講學粹語錄”，於是2013年1月在香港出版了前者，後者於同年6月出版時，《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在香港已第二次印刷，反應相當好。至於國內的簡體字版也於2014年1月在北京後浪書店發行，頗受各界人士的歡迎，本人也收到該書店多套贈書，到了3月份已印刷達五次之多。可能因為發行網廣，幾個月前，有友人在新界大埔也已看到有書店在售賣簡體字本的“中國經濟史”了。

錢師的課堂經濟史稿之所以頗受歡迎，除了錢師講學有其獨特與精彩的見解以外，得加上國內經濟界名人林毅夫先生的作序品題，還有據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家丁望先生早前曾在香港《信報》撰文報導：有北京劉亞洲將軍對錢師加以讚揚，說錢師在經濟史和他的其他史著中，闡述分析中國古代執政者之所以不能戰勝常來騷擾的匈奴與羌人等民族，是

由於我國北方與西北有大高原，而游牧民族卻善用騎兵能征慣戰，而漢族人民以農耕為主，不諳騎兵作戰，以致常吃敗仗。直到漢武帝亦懂得養馬習騎，才把匈奴、羌等少數民族征服，國家才得統一。當然現在我國已是五十多個民族大團結，早已沒有游牧與農耕之別。舊說農、工、商、學、兵，現在行業更多了，大家各自在其本位上努力着。

錢師講的“中國經濟史”造成了各方的轟動，連月來有北京的、成都的以及廣州和深圳的報刊記者來訪問我，有的還來了多次，並在上述各地報章大篇幅加以報導。在下在此衷心表示感謝，大家都是在同一目標下，為要把中華學術文化加以發揚光大，為要把錢師所擁有的滿腹經綸，讓沒有能在新亞書院聽過課的同胞都能得到分享。錢師一生絕不重視衣食住等各方面的物質享受，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他只希望我們每一位中國人能多讀一點中國的典籍，能多學習一些中國的歷史文化，讓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是何等的偉大，他就於願足矣。

說實在的，錢師無論講哪一門課程，都有他精彩獨到的見解，他在新亞開的課據我記憶所及，有中國通史，還有中國的秦漢史、文化史、思想史、經濟史、文學史以及社會經濟史、論語、孟子和莊子等；至於在新亞研究所錢師還開了“韓(愈)文”與“詩經”，那是必修的。同時他在戰前北大等校，八年抗日戰爭時期在西南聯大、武漢研究所諸校及抗戰勝利後在江南大學，以及在台北文化大學碩士、博士班等校授課，據我所知他尚有開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史學名著選讀……等課。近日我重讀錢師講的“中國文學史”，覺得他對歷史地理也滾瓜爛熟，他還指出太史公因不熟悉歷史地理，把古人的著作寫對的當作寫錯來看。錢師是應該可以開“中國歷史地理”的。其實，錢師沒有把握絕不會開那麼多科目，錢師常說，一個人並非大學畢業就算是完成了，也不是讀了一個碩士甚至一個博士學位就成功了。讀書是一輩子的事，做學問是終生的事業。錢師就是希望我們要向他學習，他用一生

的精力，把中國的經、史、子、集都讀通了，所以他講任何一門課，必定有其獨特的見解。

近期友人常有勸我，尤其是唐端正學長及夏仁山學長多次敦促我把錢師講過的課堂筆記整理出來，好讓大家都可以閱讀。由於當年其他同學聽了錢師的課，雖然也有做筆記的，但都不夠詳細，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錢師 1955 至 1956 年講的“中國文學史”。為甚麼呢？我雖有讀“哲學教育系”，讀新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較”，但研究所畢業後，我留校擔任助理研究員，是錢師指導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多年，直至 1963 年錢師辭職前一年。雖然我又在 1969 年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重讀了一個主修中國歷史的榮譽文學士，但後來經錢師向羅慷烈師多次推薦，終於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完成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國古典文學。更湊巧的，當我獲得博士學位不久，香港佛教會的寶燈法師邀請我擔任能仁學院（按：此校在台北教育部立案）院長並兼哲學及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但當時台北教育部規定，副教授可擔任代院長，正教授才可任院長。我雖在新亞教過大一國文七年，但只是一個兼任講師，後來在 1972 至 1974 年擔任嶺南書院中文系專任講師兼助理訓導長時，仍未得到副教授資格，於是港大的兩個高級學位正好派上了用場，我先用港大博士論文，經台北審查獲通過得副教授資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長，而我的大專服務年資已夠長，於是再將我尚未公開發表的碩士論文〈王安石詩研究〉，再送台北教育部申請升等，更奇妙的是，經嚴格審查通過獲升正教授，使我擔任了名正言順的院長。這裏得感謝羅慷烈師對我攻讀碩士的悉心指導，並妥善安排我攻讀港大博士學位，終於順利完成，使我難忘師恩。

由於上述因緣，我先整理錢師的“中國文學史”講稿會比較輕鬆些。當我讀到這本筆記本第一篇“緒論”的最後兩行字時，內心感到高興，錢師以肯定的語氣說道：

“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

上述這段話，我當時如實記錄下來，沒有增添減少，其用字修辭甚至造句，絲毫沒有改動。使我高興的，是1955年9月某日，錢師開講的第一天，他竟說出：“過去還沒有出現過一本理想的文學史。”因錢師一向是說話謹慎謙虛的，說出這句重話豈不是會得罪好多曾經撰寫並出版過“中國文學史”的學者或教授？無論如何，過去寫中國文學史的作者除非他心胸寬宏大量，不然，他們內心一定會感到不舒服的。但是，錢師當時如此批評，實在少見。我和一羣同學多次在課餘時圍着聽錢師教誨：“你們讀了我的《國史大綱》，還可去多看些別人寫的‘中國通史’，可以作出比較，看看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接着的一句大意是：“你們自己去選擇吧！”這一類的話。但使我高興的，便是由錢師來講“中國文學史”這門課，必定有它獨特之處，亦即是錢師所講，必定有他創新的見解，讓我們可把過去曾看過的其他“中國文學史”作出一些彌補。錢師並不是說，憑他個人講堂授課，可以把“中國文學史”講得十全十美，他是肯定的說：“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這裏錢師明明說並不是靠他個人可以力挽狂瀾，乃是要靠大家共同來努力，要靠大家一同來尋求，一同來創造，以達到成功之路。記得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有一次參加新亞研究所的師生月會報告，錢師也在場，他曾說：“世界上沒有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但錢師在“中國文學史”有關重大問題上卻可作出自己的見解，這便是有益後輩。

舉例說，錢師是非常欽佩，可說是非常敬佩朱夫子（熹）的，不然，錢師也不會在晚年用他十年八載的精力來撰成《朱子新學案》，連他的知己好友羅懋烈教授也談到錢師的一生代表作時說：“錢先生，自從晚年完成《朱子新學案》後，他早先被譽為權威著作的如《先秦諸子繫年》、《兩

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以及《國史大綱》等名著，都得讓位了。”錢師在講“中國文學史”的《詩經》時，雖然對朱子也有讚語，他說：“朱子解釋《詩經》有創新之意。”意即朱子有與前人不同的解釋，但錢師也毫不客氣的指出朱子有時解釋《詩經》也有錯失。因為朱子只用直指其名直敘其事的“賦”來解釋《詩經》，而錢師認為解釋《詩經》可有兩種方式，他為取信於聽眾，舉出中國文學史上三個不同時代和作者的文學作品來證明，使人無懈可擊，這就是錢師所持有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做學問態度。

錢師的著作，也不是沒有疏誤，他在向我們講“中國通史”時，多次講起他曾請呂思勉先生為其《國史大綱》校閱一遍，還請繆鳳林教授校正該書的疏誤，並在再版時一一加以訂正。錯就是錯，錯了就得改，沒有客氣講。錢師指出太史公司馬遷講到《離騷》時，他不識歷史地理，以為古人把地名寫錯了，還把原文對的反而改為錯。錢師指出我國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別的意義，譬如“霍山”這個山名，在我國的安徽與山西均有霍山，小山為大山所圍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詞，並非專有名詞。又如“洞庭”這個湖名，並不限於只有湖南省才有，即是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的現象”者，都可以稱為“洞庭”，因湖南的“洞庭湖”通湘、資、沅、澧諸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稱，因為太湖是通黃浦江、吳淞江等多條水，所以太湖也可稱“洞庭湖”。錢師說：太史公把《楚辭漁夫》篇所說的“寧赴湘流而葬江魚之腹中”一句，認為有誤，特改為“寧赴常流”，其實“湘流”並不錯，倒是改為“常流”卻是錯了。司馬遷以為“湘水”在湖南，怎麼人在鄂(湖北)卻會在湖南的湘水自殺呢！錢師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漢北時所作，所說之“湘流”，實是指“漢水”，而並非“湘水”。這就是錢師的博學而無所成名。講文學史亦得要義理、考據和辭章三者兼顧，不但要講其歷史演變、創作目的和字句修辭，而且還要了解歷史地理，懂得校勘學，所以讀書做學問真不容易，少一瓣就會出錯。

一部中國文學史，等於錢師平常所講的，它包括了唱的和說的文字，即包括原始詩歌和故事小說，還有做的文學如舞蹈戲劇，以及正式用文字寫成的文學，單是文字方面的作品，三千年來如此眾多的作品和作家，欲在一年的課程中來加以詳細闡析所有作品，當然並非易事，但錢師每逢遇着時代大轉變，而大家對某一類重要創作，在意見上有重大分歧時，他必定會作出明確的決斷，並提出有力論證，使人心服。

錢師做學問的一貫主張是：歷史應還其本來面目，不能曲解事實。不可貽誤後人。不過有一點可以補充說一下，錢師自己說曾在新亞時講過兩年文學史，但他校務冗忙，沒有把學生課堂筆記本加以整理改定。我聽錢師這門課是在 1955 年秋至 1956 年夏，錢師還查閱過我們的筆記，兩次是由助教查看，給了我高分。一次是錢師自己查閱，只用紅筆寫了“五月四日”。如果當時錢師欲改定筆記本，很可能會取用我的筆記本，因為只有我全懂他的無錫國語，可惜他當時忙不過來。錢師還說曾講了兩次，我又在 1958 至 1959 年 4 至 6 月這段時期聽錢師講宋元明清時代的文學史，那正是我攻讀研究所時期，有空就去聽，約有十多次，也記下了些筆記。最後，我把錢師親自擬的兩次文學史考試題目，都附錄於後，一次是 1956 年 6 月期終考試題目；一次是同年畢業考試試題，如果我們能夠根據錢師全年所講的，溫習後圓滿作答，那也是錢師希望我們學習的（當然我們能多看參考書最好），那我們對中國文學史也可以明瞭得一個大概了。但錢師說過，研究文學史是一輩子的事，希望吾人來共同尋求與創造。同時，本記錄稿難免有疏失之處，文責應當由筆錄者來負。尚祈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今將錢師親擬兩次試題抄錄如下：

1956 年 6 月“中國文學史”期終考試試題：

（一）曹丕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如何？

- (二)兩漢文學風格不同，此與社會有何關係？
- (三)《昭明文選》之取材標準如何？其在文學史上有何意義？
- (四)試略述唐以後歷代散文之發展及其代表人物。
- (五)中國小說至唐始盛，其原因安在？
- (六)試述詞與曲產生之原因。

1956年6月“中國文學史”畢業考試試題：

- (一)試述漢以前散文文體之變遷。
- (二)《楚辭》之產生與《詩經》有何關係？
- (三)(與期考第2題完全相同)
- (四)何以謂建安時代為中國有文學自覺之始？
- (五)試述《昭明文選》與《古文辭類纂》兩書在文學史上之意義與價值。
- (六)唐詩分為幾個時期？各時期之代表人物為誰？
- (七)試述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價值。
- (八)詞之產生原因安在？其題材與對象與詩有何不同？

葉龍序於香港青衣島

2014年4月8日

2014年12月28日訂正